

中国现代史论·第一卷

薛庆超 著

长征中的重大决策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人民出版社

中国现代史论·第一卷

薛庆超 著

长征中的重大决策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现代史论. 第1卷, 长征中的重大决策/薛庆超著.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0. 4
ISBN 978-7-220-08101-9

I. ①中… II. ①薛… III. ①中国—现代史—史料
②二万五千里长征 (1934~1936)—史料 IV. ①K26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55201 号

ZHONGGUO XIANDAI SHILUN

中国现代史论·第一卷

长征中的重大决策

薛庆超 著

策划组稿	刘周远 李洪烈
责任编辑	王定宇
封面设计	邹小工 王泉语
技术设计	戴雨虹
责任校对	徐 英
责任印制	李 剑 孔凌凌
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 (成都槐树街2号) 四川人民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scpph.com http://www.booksss.com.cn E-mail: scrmcbf@mail.sc.cninfo.net
发行部业务电话	(028) 86259459 86259455
防盗版举报电话	(028) 86259524
照 排	四川胜翔数码印务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成都金龙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成品尺寸	170mm×240mm
印 张	19
字 数	320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20-08101-9
定 价	35.00 元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电话: (028) 86259624

总 序

一、关于中国现代史的起点问题

中国古代典籍《左传》中曾经写道：“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三不朽。”

唐代经学家孔颖达对立德、立功、立言作了注疏。他指出：“立德，谓创制垂法，博施济众；立功，谓拯厄除难，功济于世；立言，谓言得其要，理足可传。”

中华民族，创业维艰，筚路蓝缕，雄踞东方。古往今来，世事交替，斗转星移，沧海桑田，而唯一不变的是对中国历史文化的高度重视与传承：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

“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

一部中国历史，记载了中国五千年以上有文字可考的辉煌，浓缩了中华民族薪火相传、绵延不绝的文明。中国古代史，先人创业，开拓封疆，创造了疆域辽阔、生生不息的东方大国。中国近代史，由盛而衰，血泪交织，记载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耻辱。中国现代史，地覆天翻，人间巨变，记载着中华民族奋起抗争、艰苦奋斗、实现中华民族伟大振兴的壮丽史诗。

关于中国现代史，有多种不同的分期：

一是以 1919 年五四运动作为中国现代史的开端，其主要根据是，在五四运动中，中国无产阶级登上了中国政治舞台，以此为标志结束了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开始了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由此从近代社会进入现代社会，也由此开始了中国现代史。

二是以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作为中国现代史的开端。其主要根据



是, 1919年至1949年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与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 其目标都是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 虽然革命性质发生了变化, 由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 但是革命对象、革命任务、革命目标仍然没有改变。而且, 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一直没有改变。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中国社会性质发生了深刻变化——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变为新民主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因此, 中国现代史应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开端。

三是把中国近现代史联系在一起, 以1840年中国人民反抗英国向中国输入鸦片而爆发的鸦片战争, 作为中国近现代史的开端。这样, 把整个中国社会由近代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 中国革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变, 中华民族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 中国人民争取自由解放的斗争, 全部联系在一起。这也是一种中国近现代史的分期方法。

四是把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历史, 从中国现代史中划分出来, 称之为“中国当代史”、“当代中国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为此, 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建立了当代中国研究所(以后划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序列), 专门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的历史。

其实, 关于中国现代史的开端与分期, 不论哪种划分方法, 只要言之有理, 持之有故, 均可成立, 接受史学界和社会的检验。凡是史学界和社会认可的划分方法, 就可以作为大家公认的划分方法; 凡是史学界和社会不太公认的划分方法, 则可以作为一家之言。

《中国现代史论》采用了以1919年五四运动作为中国现代史的开端。因为多年来, 人们已经习惯了这样的划分方法。

二、关于《中国现代史论》的若干问题

人类对于浩瀚宇宙的认识永远是一个过程, 新的认识、新的发现、新的探索总是层出不穷。

人类对于历史科学的认识没有终极真理。因为新的史料、新的发现、新的认识、新的观点、新的思想, 总是在不断地出现, 并由此推动着历史科学不断发展, 永远不可能停留在一个水平上。

《中国现代史论》就是在前人开拓的基础上, 在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以后, 作者对中国现代史上一系列问题深入探索的结果。这些问题包括:

中共中央在长征中的一系列重大决策……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过程与胜利……

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从战略进攻到夺取全国胜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发展与巩固……

“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爆发与十年内乱……

林彪为何成为“接班人”？林彪集团的形成、崛起与覆灭……

江青集团的形成、崛起、衰落与覆灭……

王洪文成为接班人的历史真相、“王洪文现象”的历史原因、王洪文被扫进历史垃圾堆的历史必然性……

“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人民反对江青集团的斗争……

中共中央决策粉碎“四人帮”的详细过程与具体实施细节……

邓小平的政治生涯中“三落三起”的历史内情……

当代中国伟大思想解放运动的缘起、发展与评价……

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央政治局会议实现当代中国历史性转折的过程……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为彭德怀、陶铸、刘少奇等一系列重大冤假错案平反的重大史实……

中国开始改革开放新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创造中华民族伟大振兴历史辉煌的历程、成就与经验……

三、关于《中国现代史论》的视角与特点

实事求是，古已有之。贵在坚持。贵在发展。贵在创新。

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过程中，古为今用，推陈出新，赋予了实事求是以新的内涵，首先使之成为中国共产党内反对“左”倾教条主义的有力思想武器，进而使之成为中国共产党全体领导干部和全体党员的重要思想指南。

邓小平站在历史发展的高度，赋予了实事求是以丰富的思想内涵、理论内涵和崭新的时代精神。他指出：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

《中国现代史论》总结、整合了作者从事中国现代史研究数十年来的研究成果、研究心得和研究体会，对中国现代史上若干重要历史、重要人物、重要史实的来龙去脉、理论与实践、探索与结果、曲折与辉煌进行了一些分析与评说。其主要特点是，始终不渝的坚持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

第一，坚持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对待历史研究。首先，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认为，全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



系都是建立在历史科学基础上的。只有研究、发现并正确的解说了历史发展规律，才能奠定阐述人类社会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走向社会主义社会的科学社会主义体系的坚实基础。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就要用辩证的思维，科学的态度，准确的史实，严谨的方法，多角度的视角，多侧面的视野，与时俱进的观点，实事求是的恢复历史本原，找出对于历史发展的规律性认识，达到还原历史、发现规律，资政育人、开拓创新、开创未来的目的。

第二，坚持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对待历史。研究历史、反映历史、复原历史、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就必须摒弃对于历史的所有伪造、篡改、曲解、戏说和捏造。例如，“文化大革命”初期，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迅速从华南上升到中央，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很快晋升为中央的第四号人物；然后，又很快被打成“党内第三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彻底打倒。对此，人们一直如坠云雾，弄不明白。《中国现代史论》实事求是地分析了陶铸上升与被打倒的真相。为了说明问题，专门以一定篇幅引用了中共中央组织部原副部长、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陶铸夫人曾志的回忆，使历史真相大白于天下。

第三，坚持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对待历史上的争议问题。对此，要坚持以重大历史事件亲历者、重大史实目击者的回忆为基本依据。关于天安门事件的真实情况，《中国现代史论》翔实地反映了天安门事件中，北京广大人民群众在天安门广场深情悼念周恩来、坚决拥护邓小平、愤怒反对“四人帮”的真实历史场景。同时，也详细引用了当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政治委员兼北京卫戍区第一政治委员吴德的回忆，从吴德的角度说明了天安门事件的起因、发展、高潮与被江青集团镇压的情况。两相对照，天安门事件的伟大历史意义便可以非常清晰地展现出来——人民群众在推动历史前进；人民群众在创造历史；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

第四，坚持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对待历史人物。东汉朴素唯物主义哲学家王充说过，对于历史人物研究，要做到：好人“不溢其美”，坏人“不增其恶”。历史人物，由于所处的历史时期、历史环境、客观条件、主观原因等诸多方面因素的制约，不可能尽善尽美，不可能完美无缺，在写历史的时候，都要真实对待，真实反映。《中国现代史论》在评价华国锋时，就对具有多方面的不同

形象的华国锋采取了这样的态度。在全国抗日战争和全国解放战争时期，他是一位从革命青年一级一级逐步成长起来的县委书记，为中华民族解放事业和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作出了贡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长期担任县委书记、地委书记、省委书记处书记，兢兢业业，踏踏实实，老实本分，联系群众，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作出了贡献。十年内乱时期，华国锋相继担任湖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国务院业务组成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国务院代总理、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毛泽东逝世后，他主持了粉碎江青集团的斗争。在担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后，既有历史功绩，也有坚持“两个凡是”的错误。对于这样的历史人物，既要充分肯定其对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粉碎江青集团的重大贡献，又要实事求是地指出其坚持过“两个凡是”的错误，不能因为肯定其某一方面而肯定其一切方面，也不因为否定其某一方面而否定其全部方面。

第五，坚持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对待重大历史事件。掩盖在重大历史事件上空的种种迷雾，造就了对于重大历史事件往往有各种各样不同的“说法”、虚构，甚至伪造。历史研究的任务，就是进行详尽的考证，力求通过翔实的第一手历史资料，弄清楚重大历史事件发生、发展、结束的前因后果与来龙去脉。《中国现代史论》对于粉碎江青集团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历史动因、中国人民的意志、中共中央政治局的精心部署、粉碎江青集团的具体过程，进行了历史考察，展示出一幅真实的历史场景，把历史的真实还原给历史、还原给人民、还原给读者。使人读后，惊心动魄，回肠荡气，进一步认识到人民群众在创造历史、推动历史前进中的“历史主动精神”和重要作用，重要人物在历史发展关键时刻发挥的重要作用，从而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有更加深刻的认识。

第六，坚持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对待重大历史疑难问题。《中国现代史论》对至今在中国和世界上还存有争议的一些重大历史疑难问题进行了解释、答疑。以消除疑问，揭示真相，拨乱反正，正本清源。《中国现代史论》对于林彪事件，就进行了这方面的澄清，给予了令人信服的回答。林彪事件已经过去几十年了，因为林彪专机在蒙古温都尔汗坠毁而点燃的大火早已熄灭。但是，各种说法却一直没有停息过。而且，往往“假说”比真实更生动、更具体、更能吸引人、更有传播空间。于是，关于林彪死亡的“中国导弹击落说”、“苏联驻蒙古军队导弹击落说”、“玉泉山说”、“林立果绑架林彪说”等等，一直在中



国、外国流传着。《中国现代史论》以权威的历史当事人回忆、苏联历史当事人回忆，缜密考证，翔实研究，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中国政府关于林彪事件公布的史实都是正确的、确凿无疑的。一些“流行的最新说法”大都属于“推测”、“设想”、“主观臆断”，并没有任何历史证据作为根据，因此是站不住脚的。

总之，坚持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就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历史；就要用实事求是的精神，辩证的、历史的、全面的对待历史；就要用辩证的逻辑、发展的思维，思考历史问题、看待历史问题；就要用历史的智慧和时代的眼光，评价历史人物、评述历史真相；而绝不能以孤立的、静止的、片面的、僵化的、一成不变的观点研究历史、评价历史人物、评述历史。

在这方面，《中国现代史论》仅仅是一个开端、一种尝试、一块“铺路石”……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也是检验《中国现代史论》的唯一标准……

作 者

2010 年春天

目 录

第一章	中共中央决定长征·····	001
第二章	红一方面军血战湘江·····	008
第三章	中共中央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	018
第四章	中央政治局委员王稼祥与政治局常委张闻天的转变·····	023
第五章	遵义会议——改组中共中央领导机关·····	035
第六章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毛泽东的政治智慧·····	042
第七章	确立毛泽东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	051
第八章	和谐气氛中的遵义实录·····	061
第九章	张闻天的重要贡献与历史地位·····	068
第十章	中共中央《遵义会议决议》·····	079
第十一章	遵义战役歼敌两个师又八个团·····	085
第十二章	组成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三人团”·····	095
第十三章	中共领袖、红军指战员与“茅台酒”·····	102
第十四章	毛泽东精心部署巧渡金沙江·····	108
第十五章	林彪上书中央 会理会议批评林彪·····	118
第十六章	刘伯承总参谋长与小叶丹“彝海结盟”·····	127
第十七章	强渡大渡河 飞夺泸定桥 泸定会议·····	135
第十八章	最早到达陕甘的南方红军部队·····	142
第十九章	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	148
第二十章	中共中央政治局确定北上方针·····	156
第二十一章	中共中央决定向陕甘进军·····	166
第二十二章	中共中央脱离危险区域·····	177
第二十三章	鲜为人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俄界会议·····	188



第二十四章	《大公报》消息“定乾坤”	196
第二十五章	中共中央率领红一方面军结束长征	207
第二十六章	中共中央决定：立即停止“肃反”，释放刘志丹	215
第二十七章	红二军团与红六军团并肩作战	223
第二十八章	红二军团、红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会师	232
第二十九章	朱德、刘伯承、任弼时、贺龙等与张国焘的斗争	242
第三十章	红军三大主力会师西北 艰苦卓绝的情报工作	251
第三十一章	中共中央确定新的政治路线	264
第三十二章	西安事变结束“十年内战”	273
第三十三章	长征的历史地位与深远影响	278
后 记		291

第一章

中共中央决定长征

中国共产党诞生以后，代表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以反帝反封建为己任，领导中国人民开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斗争。20世纪30年代初，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东北，并企图进一步侵占中国全境，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和全国各族人民掀起了强大的抗日救亡怒潮，进行了长期不懈的斗争。但是，国民党政府置民族危亡于不顾，推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集结重兵，一次又一次地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个革命根据地和工农红军发动“围剿”，企图消灭中国革命力量。为此，中国共产党领导各个革命根据地和工农红军进行了多次艰苦卓绝的反“围剿”斗争。从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开始，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共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同年9月，由于王明将要到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中共临时中央在上海成立，主要负责人是“左”倾教条主义的代表人物秦邦宪（博古）。1933年1月中央领导机关迁到中央革命根据地，1934年1月召开了以“反对主要危险的右倾机会主义和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调和态度”为目的的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左”倾教条主义达到顶峰。

从1933年9月开始，蒋介石调集国民党军100万兵力对各个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五次大规模军事“围剿”，其中50万兵力用于围攻中央革命根据地。国民党军采用持久战和堡垒主义的新战术，于28日占领黎川。9月，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自上海来到瑞金。博古和李德一起直接控制了红军的指挥权，推行单纯防御的军事路线，先是实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遇到挫折后又实行防御中的保守主义。从1934年1月下旬到3月下旬，红军在许多战役、战斗中均遭失利。从4月中旬至下旬，国民党军集中11个师进攻广昌，企图打开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北大门”，尔后夺取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首都——瑞金。



中共中央的“左”倾领导者为了保卫广昌，调集红军主力9个师的兵力，死打硬拼，采用阵地防御结合“短促突击”的战法，同国民党军决战。虽然红军给予国民党军重大打击，但红军主力也遭受重大损失，终于被迫撤出广昌。接着，在敌军新的进攻面前，“左”倾领导者又分兵六路全线防御，使红军和中央革命根据地遭受重大损失。

这时，因蒋介石坚持对日本妥协、对内内战，导致国民党政府的营垒中出现分裂。曾经在上海抗战中拒绝蒋介石的对日妥协政策、给予日本侵略军沉重打击的国民党军第十九路军，被蒋介石强令开赴福建“剿共”，企图借刀杀人，使中国工农红军与第十九路军互相残杀，借以达到“一石二鸟”的效果。第十九路军识破了蒋介石的计谋，开赴福建后立即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取得联系。1933年10月26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及中国工农红军全权代表潘汉年和国民党福建省政府及第十九路军全权代表徐名鸿在瑞金草签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11月20日，第十九路军将领蔡廷锴、蒋光鼐与国民党内李济深、陈铭枢等一部分反蒋势力，发动福建事变，在福州成立抗日反蒋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蒋介石迅速从“围剿”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北路军中抽调11个师（包括在江浙一带的第八十七师、第八十八师）入闽，蒋介石自任“讨逆军”总司令，向第十九路军和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发动进攻。在蒋介石的军事压力下，第十九路军内部发生分化，翌年1月，历时53天的福建人民革命政府遂告失败。关于第十九路军的阶级性质，毛泽东后来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中作了进一步分析，指出他们代表着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乡村的富农和小地主，同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地主阶级、买办阶级是有区别的。中共中央犯了“左”倾关门主义错误，在军事上没有给第十九路军以应有的支援，主动放弃了这个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可以团结互助的同盟军。

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在中国共产党内“左”倾教条主义负责人的错误领导下，屡次遭到失利。1934年7月，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临时政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①发布命令，以红七军团作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向闽、浙、赣、皖边一

^①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也称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军委”、“中革军委”，1931年11月25日成立。长征中的军委纵队，原包括由红军总司令部及其直属机关组成的军委第一纵队（第一野战纵队），以及由中央机关和后勤系统组成的军委第二纵队（第二野战纵队）。二者于1934年10月11日组成，同年12月18日合编为中央纵队。

带进军，以红六军团从湘赣革命根据地突围西征，由此拉开长征序幕。

1934年夏，日本帝国主义进一步扩大对华北的侵略。此时，国民党政府正在派出国民党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五次大规模“围剿”。在国民党军以重兵向中央革命根据地腹地进攻的形势下，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决定，由红七军团组成的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立即向闽、浙、皖、赣边出动，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推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同时调动与牵制国民党军“围剿”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兵力，减轻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压力。这是一个重要的战略行动。

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下辖3个师，共6000余人，寻淮洲任军团长，乐少华任政治委员，曾洪易（后叛变）为中共中央随军代表。1934年7月6日晚，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从江西瑞金出发，经福建长汀、大田、尤溪、谷口、水口，直逼福州近郊。福建国民党当局十分震惊，迅即调集重兵进行追击和堵截。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边战边走，向闽东转移，相继攻克罗源县城、穆阳镇和庆元县城。9月初，进入闽北革命根据地东北古楼一带游击区。接着，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向浙西挺进，先后攻占清湖、常山等城；继而转向皖赣边行动，于10月下旬进至闽浙赣革命根据地，在德兴县重溪与红十军会合。11月4日，与红十军合编为红十军团，继续担负抗日先遣队的任务，刘畴西任军团长，乐少华任政治委员，红七军团编为第十九师，红十军和地方部队编为第二十师、第二十一师。这时，中共中央已率红一方面军主力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战略转移。红十军团改由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坚持斗争的中央军区指挥。11月中旬，第十九师向浙皖赣边进发。11月18日，中央军区鉴于国民党军对闽浙赣革命根据地的“围剿”日趋严重，决定红十军团率第二十师、第二十一师转到外线作战，会同第十九师在开化、遂安、衢县、常山地区活动，创建浙皖边根据地。并组成以方志敏为主席的军政委员会，领导红十军团的行动。

11月下旬，红十军团主力向浙皖边前进，12月10日在皖南汤口地区同第十九师会合。这时，国民党军两个多旅的兵力分南北两路向汤口进逼。14日，红十军团利用乌泥关至谭家桥段公路两侧有利地形进行伏击，战斗失利，第十九师师长寻淮洲负伤后牺牲。随后，国民党军1个师又两个旅及一些地方部队共约20个团的兵力蜂拥追来。12月下旬至次年1月上旬，红十军团为摆脱国民党军，艰苦转战于皖南地区，进行大小战斗十余次，损失严重。1935年1



月中旬,红十军团向闽浙赣革命根据地转移。进至德兴县港头村时,遭到国民党军优势兵力袭击,红十军团部队被截成两段,红十军团主力约2000人被围于怀玉山地区。经七昼夜顽强战斗,红十军团指战员大部牺牲。方志敏、刘畴西在突围中被俘,后于南昌英勇就义。红十军团先头部队1000余人在参谋长粟裕、政治部主任刘英率领下,突破国民党军的封锁线进入闽浙赣革命根据地,经过整编,组成500余人的红军挺进师。此后,红军挺进师在师长粟裕、政治委员刘英率领下,转战至浙南,开辟了浙南游击根据地,坚持游击战争。

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虽遭失败,但扩大了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国工农红军的影响,推动了群众性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配合了中共中央率领红一方面军的战略转移。

1934年夏天,湘赣革命根据地反“围剿”失利。在国民党军的进攻下,湘赣革命根据地的面积日益缩小。7月23日,中共中央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红六军团撤离湘赣革命根据地,到湖南省中部发展游击战争,并同由红二军团改编的红三军取得联系,配合红一方面军的战略行动。据此,中共湘赣省委和湘赣军区成立了以任弼时为主席的军政委员会,领导红六军团的西征行动。

8月7日,红六军团率领第十七师、第十八师和红军学校共9700余人,由江西遂川的横石和新江口地区出发,突破国民党军设在衙前至五斗江、遂川至黄坳、遂川至七岭、寒口至广东桥的多道封锁线,于11日挺进到湖南桂东以南的寨前圩。至此,红六军团胜利突破重围,跳出了国民党军的包围圈。12日,红六军团领导机关正式成立,萧克任军团长、王震任政治委员。当日晚,红六军团从寨前圩地区出发,经汝城、资兴、郴县、桂阳、新田县境,于23日到达零陵东北蔡家埠地区,准备西渡湘江。这时,国民党军1个旅及保安部队已先红军1天到达湘江,沿江展开布防,而国民党军追击部队1个师已进到阳明山地区,另1个师和2个民团正分路向零陵、道县开进。在国民党军重兵前堵后追的情况下,红六军团决定放弃由零陵地区抢渡湘江的计划,迅速向东转移,于25日挺进到阳明山区。此时国民党军已分别从南、北、西三面逼近阳明山。

红六军团为甩开国民党军,采取兜圈子的战术,于8月26日进到白果市。随后又急转南下,28日到达嘉禾附近,接着急转西进,连续急行军3天,于8月31日乘虚在道县以南的薛家厂渡过潇水,甩掉了追击之敌。继而,经清水关进入广西北部。9月3日,红六军团在灌阳县文村击溃国民党湘军一部和桂

军2个团。次日，于兴安县界首以北凤凰嘴地区渡过湘江，进占西延城。11日，进至城步以西的丹口地区。接着，红六军团继续西进，准备在绥宁以东地区侧击由城步向绥宁方向前进的国民党湘军，未能得手。红六军团随即向南，袭占通道城。18日在靖县新厂歼灭湘军2个团大部。10月1日，袭占贵州省的旧州。国民党军为阻止红六军团同红三军会合，以入黔的湘军、桂军主力进至石阡及镇远县拦截，以桂军、湘军、黔军各一部由南向北压迫，企图将红六军团消灭在石阡地区。7日，红六军团在石阡西南甘溪同桂军第十九师遭遇，一部被截断（后与红三军会合），红六军团主力转入石阡、余庆、施秉之间的高山密林，同国民党军20多个团周旋。与此同时，红三军主力由黔东革命根据地沿梵净山西麓南下接应。10月23日，红六军团主力到达贵州省印江县木黄。24日，与贺龙、关向应率领的红三军胜利会师。26日，红三军和红六军团在四川省酉阳县南腰界召开庆祝会师大会。

红六军团经过近80天艰苦转战，行程2500余公里，打破湘、粤、桂、黔四省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胜利地完成了突围西征的任务，并为中共中央率领红一方面军长征起到了侦察、开路的先遣队作用。

在中共中央直接领导的中央革命根据地，从1933年9月至1934年夏天，红一方面军进行的第五次反“围剿”作战，由于“左”倾教条主义的临时中央领导人博古（秦邦宪）和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的错误指挥，致使红一方面军屡战失利，中央革命根据地日渐缩小。1934年4月，红一方面军在江西省广昌与国民党军进行决战后，损失严重，形势危殆。5月，中共中央书记处作出准备将红一方面军主力撤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决定，共产国际研究后，予以同意。中共中央为筹划战略转移事宜，成立了由博古、李德和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7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红七军团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向闽浙皖赣边挺进；红六军团从湘赣革命根据地突围西征，到湘中发展游击战争，目的是在调动国民党“围剿”军，以减轻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压力。但是，未能达到预期的目的。10月初，国民党军向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区域进攻，迅速占领了兴国、宁都、石城一线。红一方面军的机动回旋余地更加缩小，在革命根据地内打破国民党军的“围剿”已无可能，于是中共中央和红一方面军被迫退出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战略转移，开始长征。

1934年10月8日，红一方面军在一份《野战军人员武器弹药供给统计表》中，详细记录了红一方面军长征出发时的兵力、装备情况：



“野战军”是红一方面军进行战略转移时使用的番号，分为红一军团、红三军团、红五军团、红八军团、红九军团和军委第一纵队、军委第二纵队，共86859人。

其中5个作战军团共72313人，有步枪、马枪25317支，短枪2804支，重机枪333挺，轻机枪285挺，自动枪28支，共29016支（挺），平均每百人拥有枪支数仅40余支。

整个红一方面军共有33244支枪，共有子弹1858156发，平均每支枪只有不到56发子弹。

整个红一方面军拥有迫击炮38门。

红一方面军长征时，还有梭镖6101支、马刀882把。由此可以看出，有一部分红军战士是手持大刀、长矛进行长征的。

红一方面军长征时，共携带冬衣83100件，平均每人不足1件冬衣。

红一方面军长征时，携带盐34826斤、钱164.2万元、药714担。

红一方面军长征时，共有马338匹。

红一方面军参加长征的5个军团中，兵力最多的是红一军团，有19880人；兵力最少的是新组建不久的红八军团，有10922人。

这就是中共中央率领红一方面军长征时的全部兵力^①。

1934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8.6万余人，从江西省瑞金、古城等地出发，开始长征。

按照预定计划，红一方面军准备转移到湘西地区同红二军团和红六军团会合。10月17日，红一方面军由雩都（今于都）南渡贡水。为了掩护中共中央和红军突围长征，江西于都人民实行赤色戒严，严密封锁红军在于都集结的消息，中共中央、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和中央政府机关也加强对干部和红军战士的保密教育，并制造各种假象迷惑敌人。为了确保红军安全、迅速渡过于都河，红军工兵在于都人民的协助下，每天傍晚前开始在于都河架设5座临时浮桥，20时以前完成，然后红军主力和中央军政机关工作人员，分批通宵达旦通过浮桥到达彼岸、开始转移。第二天7时以前，红军工兵又将浮桥拆除，隐蔽在于都河岸边或浅水中，不留任何痕迹，使敌人难以察觉。傍晚前再次重新架设浮桥，让第二批长征部队通过。如此建了又拆，拆了又建，直至10月20日长征部队全部过了于都河。由于保密工作严密、措施得当，使得国民党军谍

^① 中国人民解放军档案馆存《野战军人员武器弹药供给统计表》。